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孙 达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下功夫，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力量和实践伟力，更加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在深刻把握重大意义中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次党内集中教育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这次主题教育强调“学思想”，就是要求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随新时代伟大变革而发展，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指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我国由大向强发展的时与势，科学回答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这一重要思想立足时代之基，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内在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这一重要思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和升华。这一重要思想植根中华文化沃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融通起来，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深入分析了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形势任务；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统揽“四个伟大”；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作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科学擘画了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充

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力量和实践伟力。

引领百年变局正确方向的思想武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在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引领百年变局正确方向，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决定一个人品质如何的是德行，决定一名党员品质如何的是党性。强党性，是主题教育总要求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强化党性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征，鲜明体现一个政党的理想信念与政治追求。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员干部的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而要在严格的党性锤炼中不断充实提高，需要一辈子学习进步，一辈子改造提升。只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在思想

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中锤炼党性，才能把对党忠诚刻在心间，在关键时刻冲在前、干在前，让党信得过、能放心。

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我们党对党性问题一直有着清醒认识，把党性教育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来抓。毛泽东同志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邓小平同志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不断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重视党性锤炼，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密码。

新征程上进行伟大斗争的客观需要。前进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要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唯有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敢为人先、迎难而上的奋进姿态，积极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争，才能顺利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性如何，决定党员干部思想境界的高低、精神状态的好坏，决定一个党是否具有强大凝聚力战斗力。世情国情越复杂、风险考验越大，党员干部越要加强党性修养。只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坚强党性，方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保持迎难而上、担当有为的精气神，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新胜利。

据《人民日报》

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昌庚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现代化，还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平稳转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国家治理到底是法治好还是人治好？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面临着法治和人治道路选择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答案。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然而，法治与政治密切相关，法治建设依赖于相应的政治支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和问题叠加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这说明我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缘由所在。

当下中国，法治问题主要是体制机制不足所致，法治建设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法治是其中应有之义。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深化改革，但改革又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古今中外概不例外。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除了审慎选择改革路径外，还需要法治保障，力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依法应对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在改革

中不断完善法治，在法治道路上继续深化改革，这是稳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策略。由此不难理解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相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由此可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两项重大战略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时至今日，虽然我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时刻清醒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两千多年的儒家历史文化土壤，以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府所产生的社会变迁及历史惯性，加以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因素，凸显出中国较长周期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复杂性，此即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转型及全面深化改革的真正特殊国情考量所在。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移民国家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经验，对于具有历史传统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典型性。对此，曾留学美国的孙中山先生在其后半生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相比较而言，传统欧洲国家尤其英国和法国的社会转型经验教训更值得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古今中外历史为鉴，寻求稳妥的改革路径，尽可能以最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社会平稳转型。为此，我国应当遵循历史惯性而非突发式摧毁或断裂历史与传统，以史为鉴，既要吸取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我国历史上清末民国初期时期以及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立足于当今中国特殊国情，中外文明互鉴，更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社会平稳转型，历史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应当是我国理想路径选择。

唯有在全面深化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方可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核心价值观、“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央八项规定及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战略部署的深层次历史意义。

依法治国应当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考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方能寻求较为稳妥的法治化路径。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

在此种改革进程中具有复杂性和渐进性，而非简单地采取理想化法治愿景。理想化的法治愿景反而可能紊乱改革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决定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就越是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稳妥协调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目的、有步骤、有序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从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顺应改革发展的政治自觉和历史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依规管党治党是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和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

全面依法治国的宗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人民是我们党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因此，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维护和保障人民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由此可见，全面依法治国的宗旨和

根本目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依法治国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衡量法治真伪，或区别法治和人治的根本标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我国法治改革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发自真诚的信仰。从立法来看，比如我国民法典历经多年立法过程，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指导下于2020年颁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民意，满足民众诉求，保障公民权益，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价值遵循。民主与法治是“孪生”关系，全面依法治国依赖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支撑。民主与法治的价值遵循决定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道路选择和目标方向，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法治的普遍规律，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化路径选择依赖于全面深化改革、立足于中国国情，遵循历史惯性，以史为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社会平稳转型的理想选择，由此决定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重大战略部署，坚持党的领导是路径选择和根本保证，最终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形成以民主与法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法治道路，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

由此可见，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国家治理现代化主题，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彰显了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唯有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视角来看，方可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逻辑建构及其深远历史意义。

据学习强国

■俞祖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贯穿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几代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奋斗探索，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条道路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先驱们的不懈探索努力密不可分。回顾这段历程，总结其经验与启示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党一经成立就成为与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推动了从早期现代化到寻求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全面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形成，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遭遇挫折后的势所必至，是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后的潮流所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现代化方案择优比选后的历史选择。

一是受挫后的觉醒。二是反省后的转折。三是比较后的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在国民党政权主导的官僚资本主义现代化被历史无情淘汰的情况下，在英美派学人期盼的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化成了梦”的背景下，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被历史证明“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是推动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经道路。

创造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

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主题之一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及促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对此，我们在创立时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党的早期领导人已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打乱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两大障碍。故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首先在“破”，即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毛泽东深刻阐释了民主革命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提出通过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创造必备的政治前提。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谈不上“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国境内的实现”。在1947年12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视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必要基础。在1948年年底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解放战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与根本方向得以确立。

中国式现代化过渡形态的孕育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与探索避不开一个重要命题：“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方式”是采用资本主义还是采用社会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前后就有了明确的选择：必须以社会主义发展实业。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方案针对当时知识界所聚焦的工化还是农化、资本主义化还是社会主义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三项选择，作了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深刻阐释。

一是“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描绘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当时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既包括狭义上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技术层面变革，也包括广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体变革”。经济技术层面，工业化被视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整体变革层面，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造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二是选择社会主义，设计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图。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上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下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三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特性”。

从某种意义来看，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之路是中国现代化在“质变”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的量变积累、是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破土而出的茁壮幼苗。

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夯实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最终作出了三个正确的历史性选择，即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领导力量、根本遵循与制度基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三个历史性选择促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转换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探索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也具有了领导大规模现代化的地位，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是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使新中国具备了加快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也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社会主义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是使中国人“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正是三个历史性选择使近代由其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效仿“他者”的现代化发展为走自己路的现代化，使被动的、依附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为主动的、自主型的中国式现代化，从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纪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据《光明日报》